

文学学科话语原理及其历史资源刍议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0732)

摘要:原理学是学科和学术之纲,只有纲举,才能目张。“三大体系”建设离不开原理学这个话语基准,而后者又必须以史为鉴,具有历史维度,即学科史维度与学术史维度。是以,从学科史、学术史出发探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原理学的使命历史性地落在了我辈肩上。如何有理有节地在继承和借鉴中扬弃与创新,决定了目标的高度和广度。

关键词:学科史;学术史;原理学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21-(2021)04-0005-08
[doi 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21.04.00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的喜庆日子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5·17讲话”和《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学场域的一些关键话题被重新激发。作为在中外文坛长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一员老兵,本人忝列其中,并就有关问题提出一己之见,自然是备感荣幸。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下的某些观点曾在本人的其他著述中有所涉及,在此重新阐发,而方法所自也,立场所由也。

1. 学科史研究任重道远

在我国,文学学科的建立是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两大学科杂糅并举的结果。从现代学科概念看,我国甚至是先有外国文学学科,后有中国文学学科;或者说,外国文学学科和中国文学学科是一枚钱币的两面,难以截然分割。现代以前,我国固有经史子集和《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但从未用学科史的方法将其来龙去脉贯穿起来,及至西方的坚船利炮撬开我华夏门户。

首先,“百日维新”托洋改制的“体”“用”思想是改良派取法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托古改制”)思想的一个显证(康有为 1958:267)。1898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也是我国第一次成规模自主引进外国文学,从而与严复、梁启超和王国维等人殊途同归。严复与梁启超分别于“百日维新”期间倡导中国文学的改革路径应以日本与西方文学为准绳。严复还于1898年提出了译事三字经

作者简介: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班牙语文学与文艺学。电子邮箱:chenzhy@cass.org.cn

引用信息:陈众议. 2021. 文学学科话语原理及其历史资源刍议[J]. 当代外语研究(4):5-12.

“信、达、雅”。“信”和“达”于翻译不必多言，而“雅”不仅指语言，还应包含遴选标准，即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梁启超也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等檄文重新界定文学价值，将文学提到了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杠杆的高度。王国维则直接借用叔本华悲剧理论创作了《〈红楼梦〉评论》(1904)。

其次是五四运动。关于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共党史明确视其为直接影响了其诞生和发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2011)，同时，它也是我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发端(五四运动故而又称新文化运动)。如果说“维新变法”取法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五四运动显然是更为明确的“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 2005a:68)。同时，五四运动以“忧国感时”“反帝反封建”为己任，强化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1998:192)在评论陈独秀时就曾说过，陈独秀对五四“文学革命”作出了三大贡献：一是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了三大主义；二是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合成了一个大运动；三是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五四运动以降，外国文学被大量介绍到中国，从而快速改变了中国的文学生态和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的认知，起到了除旧布新、引领风气的功用。鲁迅(2005b:525)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于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家的东西就特别多。”

《新青年》《小说月报》等刊物利用外国文学宣传科学、民主和民族独立思想，如此，英、法、德、意、西文学和俄苏文学、东欧被压迫民族文学以特刊形式得以译介。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鲁迅还与茅盾联袂创办了《译文》杂志。除国外现实主义文学外，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文学也一股脑儿进入我国，后者在上海等地掀起了现代派诗潮。从“鲁郭茅巴老曹”到以冯至为代表的抒情诗人和以卞之琳、穆时英为旗手的新诗派，中国新文学大抵浸润在蜂拥而至的外国文学和本国现实两大源头活水之中，而且多数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也大抵是一手翻译、一手创作的“双枪将”。故此，围绕外国文学翻译，鲁迅和瞿秋白曾同梁实秋、林语堂和陈源等人进行辩论。鲁迅(2005c:364-365)曾系统阐述其翻译观，主张“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他针对一些“宁顺不信”说，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观(所谓“硬译”说便是梁实秋对鲁迅的反诘，而“直译”才是鲁迅倡导的方法)。瞿秋白进而提出了“信顺统一”。这些都是他们在翻译实践中得出的基本判断。这已经牵涉到文学翻译的“归化”和“异化”问题。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和评价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新文学乃至白话文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出于革命斗争和思想启蒙的需要，外国文学的译介一直十分注重思想性。鲁迅自《摩罗诗力说》起便以特有的洞察力和战斗精神激励文学工作者。茅盾关于外国文学的不少见解也主要基于社会功能和思想价值。茅盾的《西洋文学》、瞿秋白和蒋光慈的《俄罗斯文学》、郑振铎的《俄罗斯文学的特质及略史》、

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吴宓的《希腊文学史》等都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专题著述。虽然这些作品还称不上多么深入的研究,但即便如此,它们的出现也并非一帆风顺。对俄国文学和东欧被压迫民族文学的介绍,先是受到了“学衡派”的攻击,后来又受到林语堂等人讥嘲。苏联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封杀与追剿。就连“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左翼知识分子也一度嘲讽鲁迅为“中国的堂吉诃德”。由是,鲁迅曾赞誉苏联文学的译介者为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郑振铎(1998:136)认为“灌输外国的文学,使本国的文学,取材益宏,格式益精,其功正自不可没”。从“娜拉的出走”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批热血青年在外国文学的感召下走向革命或抗日救亡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从学科的角度看,我国的文学史理念和文学史写作也直接受到了外国同行的影响。首先,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是由俄国学者瓦·巴·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于1880年出版的,尽管它只是有关经史子集的泛泛而论。在此之前,我们有的确只有经史子集,或以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分而治之,却古来无史。至于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文学史则是龚警凡的《历朝文学史》(1906)。它可能起笔于“百日维新”时期(即1898年前后),但目前所能查考的最早版本是1906年。此后开始陆续有中国文学史或文学史纲出现,但大抵不是真正的文学史,之所以如此断言,是因为它们尚未形成明确的学科史概念,更没有将小说和戏剧纳入视野。第一次具有鲜明学科史理念的中国文学史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1923)。用鲁迅(2005d:4)的话说,我国小说“自来无史”,但整个中国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以这部小说史呼应了梁启超关于小说的惊世之谓。

如今,我国各类文学史多达三千余种,其中包括数百种外国文学史或国别文学史。学科意识固然日渐明确,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同心圆式价值标准却尚未建立。这既是我国文学有高原、缺高峰和文学创作与评价标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根本原因。

2. 学术史研究方兴未艾

作为学科基础的文学史书写方法歧出,观点五花八门,其中固然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却是由学术史研究的阙如所致。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学术范式纷纷扰扰,各种观念潮起潮落,导致碎片化、唯文本论甚嚣尘上,历史虚无主义和自话自说所在皆是。当然,数干部文学史中不乏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优秀作品,但总体说来大抵呈现扁平化和多元发散态势。

学术史研究发轫于俾斯麦时期,适值德国统一并作为强国崛起,而学术史研究方法明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从此,德国学术再次影响现代西方乃至世界学苑。我国早期学术史研究起始于“百日维新”,受“体”“用”思想驱使,梁启超(2016:2)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明确指出,“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

来龙去脉”。

自此之后,我国前辈学人如鲁迅、茅盾、郑振铎等曾自觉运用学术史方法,对中外文学进行了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开拓。譬如在稽考神话源头时,鲁迅(2005c:19)就曾发表了富有唯物主义精神的洞见,“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随繁”。这与马克思关于希腊神话及其作为西方文学武库的言说如出一辙。

学术史研究方法虽然早已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常规武器”,但从过去几十年的情况看,无论国内国外,它都面临危机。学术碎片化和唯文本论(德里达谓“文本之外,一切皆无”)泛而滥之。正因为如此,重启学术史研究方法,至少具有几重意义:之一是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民族经典在此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如是,夏志清的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不知让多少“鲁郭茅巴老曹”让位于“张爱玲们”;二是在作家作品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学术史乃至学科史研究,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这是避免低水平重复,杜绝形而上学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三是阻断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以降唯文本论所奉行的拔起萝卜不带泥的批评,让文学作品适当回归其从出的土壤;之四是社会历史批评与审美批评二者不可偏废。考我国两千多年学术史,从“文以载道”说到目下无比纷杂的种种“主义”和“网络化”趋向,越来越众声喧哗。这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资本从地区到国家再到国际垄断的重要症候。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35)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曾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我们的难题是既要快速补课,还要有所持守,甚至必须高举全球化大旗以继续发展和壮大自己,并兼济全人类。这就尤其需要进退中绳,取舍有度,以便在国家和阶级消亡之前守护民族利益,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否则,自救不擅,何以善人?

同时,民族虽然是在人们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但它归根结底只是个历史概念。犹太基督教思想将民族的发生和发展说成是上帝的安排,并使相关民族以“上帝的选民”自居,其他宗教也有类似的说法。即使是在达尔文进化论流行之后,基督教神学等也能自圆其说,谓适者生存只是一种表象,一切皆取决于上帝的意志,否则许多自然及人类演变的偶然性就无法解释。与之不同的是,人类学家摩尔根通过考察美洲印第安部落,对民族的产生作出了相对科学的解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将民族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认为建立在氏族、部落、族群基础上的民族乃是私有制发展的需要,继而成为诸多国家的自然基础。由此看来,民族是一系列分化组合、再分化再组合的过程;而且历史使然,有生必有死,一旦私有制消

亡了,随之不复存在的便是国家、民族、阶级等;而种族虽然是个纯粹的生物学概念,却与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信仰或思想的宗教更是如此。因此,在极端的西方右翼思潮中,民族又常常是与种族、宗教、习俗、语言等联系在一起的。

有鉴于此,价值观的持守和重建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务之急,也是发达国家正在面临的历史课题。当然,强调民族认同和国家意识既不能滑向泛世界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可主张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

人类藉人文以流传、创造和鼎新各种价值。语言文学作为人文基础,其肌理决定了它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和文化基因或精神染色体的功用而存在并不断发展,因此,语言文学不仅是审美对象,还是民族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这就牵涉到语言文学与民族之间那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这是就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及其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而学科史、学术史和原理学正是厘清复杂问题的有效抓手。

3. 文学原理学研究刍议

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到塞尔登的《从柏拉图到现在》再到近年接连出版的《文学导论》,西方诗学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历程。我国从刘勰的《文心雕龙》到目下的各色文学原理、文学概论也有了近两千年的历史,但是,“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经典”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三大体系”建设迫切需要我国学者立足本国、立足当下,践行“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是故,重新梳理和检点文学原理被重新提上了日程。

简而言之,原理学旨在探寻规律。无论文学多么玄妙、如何言说不尽,它终究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其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或/和格律诗)、成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或/和回忆录)是一种概括;自上而下、由外而内、从宽到窄、自强到弱、由大到小等等,也不失为是一种大势。犹如被幽暗的森林(及其狮、豹、狼)阻断前途的但丁必得经历史的维吉尔相助方能豁然,规律的探询离不开历史的维度。也就是说,文学的言志与抒情、有用与无用、主题与情节、载道与消遣、反映与表现等既可能并行不悖、彼此兼容;但也完全可能形同水火,构成二律背反,恰似矛之于盾、盾之于矛。并行不悖或此消彼长也罢,二律背反或对立统一也好,文学原理只有在历史和时代社会的纵横坐标中才能道明说清。反之,一旦置概念于学术史和现实语境这两个维度之外,接近文学规律或文学真谛的努力也就付之阙如了。

中外先哲多热衷于探询文学真谛,盖因文学最敏感,其触角直击世道人心,被誉为时代的晴雨表。如此,有关文学原理的讨论如长江之水从远古走来,向未来奔去,滔滔不绝。中国古典诗学被认为发轫于老庄和孔子,西方诗学则明显起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此等滥觞随着历史的沿革不断丰富乃至汇集成目下的汪洋大海。在此过程中,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思辨传统与俾斯

麦时代兴盛的学术史范式使美学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维度上完成了交织与融合,但这种学术史范式在我国学术研究中还相当欠缺。

为说明问题起见,不妨缩小范围,自近百年来影响我国文坛的文学原理学说起。从1925年马宗霍先生发表首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论》到1953年苏联文艺理论家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的引进、1964年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或波斯彼洛夫的同名著作或蔡仪的《文学概论》(发表于1982年,但实际写作时间为20世纪60年代)到目下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原理、文学概论或诗学、诗论等,洋的、土的、古的、今的,可谓汗牛充栋。下面姑且以我们相对熟识的近百年历史为经,以三种代表性著述所蕴含的时代为纬,来简要假说现有文学原理及批评理论、批评方法和价值标准的局限。

首先是马宗霍先生的《文学概论》,凡三篇,由“绪论”“外论”和“本论”组成。马宗霍显然是受了五四运动的刺激,试图用本体论与方法论相结合的路径建构现代文学原理,其中回荡着刘勰、钟嵘等古代诗学家声音,攫取的几乎皆为中国本土材料,且偏重于文字学方向,故而略嫌狭窄。虽如此,然作为首创,亦功不可没。在界定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这个偏正结构(文与学)之后,作者(1935:6)认为凡文学者,一属于知,一属于情。属于知者,其职在教。属于情者,其职在感。在“法度”章中,作者认为文学既不可无法,也不可泥法;复在“内相”章中说到古来文学一曰有神,二曰有趣,三曰有气,四曰有势;又在“外象”章中归纳出四曰,即声、色、格、律等;基本以汇集古来文人学者并各家之说而成,尽管偶尔也会牵涉西洋人等的相关点滴学说。此类以中国古典诗学观念为基准的文学原理学延绵不绝,且愈来愈多地同西方诗学杂糅。当然,坚持中国诗学体系纯粹性(包括材料和认知)的学者依然不在少数,例如认为中国有独立完备的诗学体系,相关观点不仅足以与西方各色流派对应,在神韵、意境、风骨、气势等方面也具有相对广阔的审美向度;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它们基本是配菜师的做法,缺乏纵深感(即学术史意识),比如说到修辞,它们可以将孔子、刘勰、归庄等并置一处,全然不顾之间的承继与变异;说到意境或其他概念也是如此。殊不知同样一个美字,古今中外的认知却是同少异多。再说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如果是客观的,为什么萝卜白菜、燕瘦环肥各有所爱?如果是主观的,为什么青山绿水人见人爱、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虽然难有定论,但若不顾时代的偏侧、历史的衍变,单说文艺司美又有什么意义?况且近百年来许多被定于一尊的不少现代经典彼此殊异,且大抵具有审丑取向,与古典美学的界定大相径庭。

其次是蔡仪先生的《文学概论》。正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刘勰 2008:308),蔡仪先生(1983:1)的这部文学概论在原理性揭示方面广泛借鉴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尽管这一文艺观带有鲜明的苏联色彩。作品凡九章,是谓“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文学作品的种类和体裁”“文学的创作过程”“文学的创作方法”“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第一章开宗明义,认为文学

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文艺理论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说,文艺的首要标准是反映生活,而且是客观的社会生活。这里最重要的当然是“客观”这个词,且不说客观是相对的,即使照相也有光与对象以及角度等诸多因素构成,遑论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原理或文学史写作中此类问题很多,但最根本的依然是学术史方法的缺失,盖因单就西学而言,客观论从模仿说到反映论、再现论经过两千多年,早就开枝散叶、繁茂无比,以至于在 20 世纪泛而滥之,出现了超现实主义、超自然主义、新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此外,我国传统诗学精神也有意无意地被忽略或罔顾。几相对位,便不能不令人唏嘘。

再次是董学文、张永刚先生的《文学原理》。这是我国近一个时期出版的诸多《文学原理》当中的一部,拿它做个案有一定的任意性,也就是说视它为之一并不意味着多少特殊的价值判断,但它确实是我国高校文学系使用率最高的,几乎没有之一(除了塞尔登的《从柏拉图到现在》)。这部作品显然较多地糅合了西方文学思想,并从“文学的本体与形态”“文学的客体与对象”“文学的主体与创造”“文学的文本与解读”“文学的价值与影响”“文学的理论与方法”等六个方面阐释中外文论,演化出文学的观念与现象、真实与超越、语言与修辞、形象与意境、体裁与类型、通俗与高雅、游戏与宣泄、阐释与批评等话题,其中有关“言、象、意”“作家、文本、读者”等尤为明晰地杂糅了古今中西文学观念。但作者在解释文学理想、文学现象时总体上以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为主要参照,而且是平面化的和相对任意的攫取。换言之,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样的原理依然缺乏基本的学术史维度,依然像是在文学概念的版图上指点江山,因而依然缺乏纵深感、历史意识和唯物辩证法思想(这正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批判的)。反之,真正的历史意识、问题意识必须尽可能地置概念、问题于历史语境当中,比如文本一词,假使你还有起码的作家关注、读者关注,那么就应该尽量回避之,盖因它是形式主义美学崛起之后,尤其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强调作品独立性时常使用的一个称谓,如罗兰·巴特(《作者死了》)和文本之外一切皆无的唯文本论思想;再比如同样这些话题,完全可以取法学术史方法,在来龙去脉中去粗存精、推导规律。当然,这并不否定他们在兼容古今中外、厘清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及扬弃文学研究碎片化、去原理化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贡献。但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用作者(2001:1,25-26)的话说,“对文学原理某些从思辨性讨论转向实证性研究的趋势并没有表明文学基本理论的探索已经完结。相反,实践表明文学原理基本概念、深刻内涵、应用前景及其新形态的展示,还远未被发掘出来,一个很大的必然王国还摆在我们面前”。既然必然王国尚在前方,那么我们距离自由王国必定还很遥远。由是,作者提出的文学功利性与非功利性、文学的感性之象和理性之意以及文学认识和评价等问题当然也远未解决。

以上所述,无论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还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自然都是相对之谓。文学原理著述多如牛毛,但归根结底,一切文学原理终究是为了

研究、总结和引导文学批评,梳理、概括和揭示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认知、鉴赏和评判文学经典首当其冲)。

真假、善恶、美丑始终是衡量文艺价值的主要坐标。是以,中外文艺界在认识论、价值论和审美维度上进行了上千年的论争。然而,由于唯文本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扫荡,近几十年我国在去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批评、去社会历史与社会历史批评、去审美理性与审美理性批评等二元对立中不断摇摆,甚至大有反本质主义的本质主义倾向,其中的形而上学、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取向不言自明,譬如用绝对的相对性取代相对的绝对性。好在我国具备丰富的伦理学批评、现实主义批评和审美批评经验,近年来随着文化自信和自觉不断深入人心,有关传统获得了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如今,如何从文学原理学的向度出发,重新审视真、善、美不仅条件成熟,而且任务紧迫。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批评的要求,也是“三大体系”建设中争夺话语权和攀登学术高峰的不二法门。随着“四个自信”逐渐深入人心,文学批评正日益回归正途,但必须未雨绸缪的是我们在强调文学伦理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同时,切不可将审美维度置之度外。时至今日,审美与审丑,乃至以丑为美只是一线之隔,界线却越来越模糊不清。历数中外当代文学经典的消长和沉浮,我们不难看出个中蹊跷,而这恰恰是重塑审美原理的理由。自从19世纪罗森克兰兹提出审丑美学至今,各种审丑逐渐下滑,进而抛弃了他关于写丑是为了审美,即反衬美、凸显美的美学宗旨,转向了以丑为美,甚至使丑学与厚黑学殊途同归,而这更是文学原理、批评话语拨乱反正、重塑新时代美学的首要任务。

参考文献

- 蔡仪. 1983. 文学概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董学文、张永刚. 2001. 文学原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胡适. 1998. 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M]. 北京:中华书局.
康有为. 1958. 孔子改制考[M]. 北京:中华书局.
梁启超. 2016.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刘勰. 2008. 文心雕龙[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鲁迅. 2005a. 鲁迅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 2005b. 鲁迅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 2005c. 鲁迅全集(第6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 2005d. 鲁迅全集(第9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 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宗霍. 1935. 文学概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郑振铎. 1998. 郑振铎全集(第15卷)[M].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2011.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明明)



陈众议，文学博士、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西班牙皇家学院外籍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班牙语文学与文艺学。专著有《拉美当代小说流派》《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博尔赫斯》《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文学通史》（合）等，文集有《亲爱的母语》《生活的意义》《想象的边际》《向书而在》《说不尽的经典》等。

苗兴伟，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兼任中国逻辑学会文体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究分会副理事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英汉语篇分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话语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生态语言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文体学、语用学和应用语言学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汉篇章语用学研究”和“英汉语篇信息组织的句法过程”，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出版专著6部，教材2部，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二等奖3次、三等奖1次。



当代外语研究（双月刊）

2021年8月 第4期（总第454期）

本刊网址：<http://ddwyyj.cbpt.cnki.net>

本刊邮箱：ddwyyj@sjtu.edu.cn

电 话：021-34205995

©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